

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

張偉保 溫如嘉

[摘要] 自十九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日趨緊密，而澳門則擔當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傳教士的推動下，澳門在1839年創辦了一所新式學堂：澳門馬禮遜學堂。雖然這所學堂在1842年遷往香港，但卻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留下光輝的歷史。換言之，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在這裏誕生了。同時，一些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功臣——如容闈和唐廷樞——也是在這裏接受他們的基礎教育。因此，這也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題目，值得我們的細心考察。

[關鍵詞] 澳門 馬禮遜教育會 馬禮遜 裨治文 顛地 容闈 唐廷樞

自19世紀開始，西方工業化正邁步前進，中外文化的碰擊也日趨激烈。在這個動盪的時代，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原因，澳門首當其衝，成為中外文化的主要角力場。其中，與商人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相似，傳教士亦成為最重要的文化使者，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線。

自從1757年清朝實施一口通商後，廣州成為中外沿海商業貿易的唯一口岸，而澳門適處於珠江口的左岸，並承襲明朝中葉以來葡萄牙人在中國的居留地的特殊地位，澳門在19世紀前期具有至關重要、不能代替的角色。外商在每年貿易季節結束後必須離開廣州，暫居澳門，故外商每年大約有一半時間逗留在澳門。此外，由於清朝不准許女眷住在廣州，故此亦必須長期留在澳門。因此，澳門自然成為廣州貿易的後勤補給基地。

由於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清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在這種緊張關係之下，天主教傳教士除了少數在北京的欽天監等機構內服務外，大部分都必須離開中國，他們只能回國或留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這對天主教拓展在華傳教事業十分不利。到了19世紀初，基督新教開始推動海外傳教工作。最先是英國的倫敦傳道會，他們在1807年派遣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來到中國。1813年又增派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以協助馬禮遜牧師的工作。1830年，首位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簡稱“美部會”）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來到中國。1833年，美部會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也來到中國，協助裨治文的傳教工作。基督新教早期的傳教工作並不十分順利，其中的因素十分複雜，除了來華傳教人員的數量偏少外，也包括中國方面的原因，如（1）中國人以天

作者簡介：張偉保，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溫如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朝大國自居，極之輕視外國人和外來宗教；（2）中國傳統教育亦有嚴重缺點，完全忽視科學和地理等新知識；（3）中國人罕能懂得外語，對中國以外的事物缺乏興趣。

一、馬禮遜教育會的成立及前期工作

1834年8月1日馬禮遜牧師逝世，部分廣州外商和傳教士認為需要延續他的教育工作，開始籌組“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正式揭開了中國教育現代化的第一頁。在裨治文、馬儒翰（John R. Morrison）等的推動下，馬禮遜教育會在1836年11月9日宣佈成立，並提出“本會的目的，是通過學校教育和其他手段，來改善並提高中國的教育”。^①教育會以“在華開辦和資助學校為目的”，^②對廣州地區和東南亞華人聚居的城市進行調查，以獲得“關於中國初等教育一般狀況的第一手資料”。^③在1837年的年度報告說：“協會已收留了5名兒童，並使他們受到教育，其中2名在新加坡，3名在廣州……此外，馬禮遜教育會還向郭士立夫人在澳門開辦的學校提供資助，數額為每年312元。”^④

早在馬禮遜學堂正式成立之前，為盡快開展有關工作，籌委會在1835年9月便開始資助郭士立夫人（Mrs Mary Wanstall Gützlaff）所主持的女子私塾。《馬禮遜教育會第一次年度報告》指出：

教育會已經用基金對郭士立（Gutzlaff，又譯作郭實臘）夫人在澳門找到的幾名孩子進行了支援……學校裏共有二十位學生。他們接受同樣的教育，幾乎相同的課程。孩子們參加初級的英語學校，接受中國老師每天額外的中文閱讀和寫作課程，英文寫作課則是由葡萄牙的一位專家來教授的。^⑤

此報告繼續說：

這所學校開始於1835年9月30日，共有十二名女學生和兩名男學生，由女子協會捐助，^⑥這個組織的目的在於促進印度和東方女童接受更好的教育。……學校為他們提供

-
- ①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7頁。吳氏在同書第338頁分析說：“應以9月28日為其成立時間。”根據裨治文在1845年的記載：“在1836年11月9日，協會在廣州正式成立。”見《馬禮遜教育會第七次年度報（中譯本）》，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1頁。故吳氏的判斷未可遽信。
- ②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9頁。
- ③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0頁。
- ④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0頁。按，梁家麟在《廣東基督教教育（1870—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年）一書中說：“1837年，該會……在廣州設立了一間學校。這學校最初僅有五名學生就讀，均來自窮苦的家庭……”（第31頁）梁氏誤將該會資助學生學習視為設立學校，是不準確的。例如，這五名學習中，有兩名送往新加坡學習。由此可見，這並不是一所學校。事實上，馬禮遜教育會自辦的第一所學校是澳門馬禮遜學堂，詳見下文。
- ⑤ 《馬禮遜教育會第一次年度報告》，收於《中國叢報》第6卷，第229—244頁；又根據*History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London, 1847, BiblioLife Reproduction, p. 33)的報導，Theodosia Barker女士在通過實習和試用階段並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中文後，被派往郭士立夫人在澳門的學校。報告書中提及的英文教員可能便是這位女士。
- ⑥ 關於這個組織，其實是與裨治文一起來華的大衛·亞庇牧師（Rev. David Abeel）推動之下成立的，有關文件見*History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pp. 260-265附件甲的“An Appeal To Christian Ladies in Behalf of Femal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Adjacent Countries”。

食宿等條件。學校的辦學模式，尤其在選拔學生方面，並不像委員們所希望的那樣；但……我們相信更多的經驗能夠進一步修改和提高教育體系，不枉費教育會對他們的支持，因為教育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像同類機構提供支援。^①

《報告》中提及兩名男生，其中之一便是中國第一個獲得美國耶魯大學學位的容閱。容氏在其回憶錄也曾指出：“古夫人所設學堂，^②本專教女士，其附設男塾，不過為馬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之預備耳。馬禮遜學校發起於1835年，至1839年成立。未成立時以生徒附屬於古夫人塾中，配撥該校經費，以資補助。”^③

關於郭士立夫人學塾的教學和生活的安排，李志剛牧師的研究指出：“學校招收學生，均需寄宿。衣服、文具、伙食等，一切均由學校供給，概不收費。全校由郭牧師夫人掌理，管理至嚴，每日上午，授課五小時，下午為集會，黃昏有晚課，至九時始休息。每週均有中英文考試，中文每週四次，由郭牧師主持。”^④

二、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及收生情況

澳門馬禮遜學堂在1839年11月4日創辦，1842年11月1日遷往香港，前後共三年，時間並不算長久。然而，它是一所以新式教育為主的新式學堂，與識字教育及科舉考試為本的傳統中國教育完全不同，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巨變。籌辦以中英雙語、引進西方科學知識的學堂是馬禮遜教育會的首要目標。這所學堂以培養具現代視野的中國青年為方向，期望他們在完成學業後為中國的未來發展作出真實的貢獻。裨治文十分明白在中國很難招聘到合適的教員，因此，教育會在1836年9月分別向英、美兩國尋求協助招聘教員，但過程並不順利。英國方面沒有任何進展，美國方面也諸多阻滯，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才能覓得合適人選。1838年10月4日，時在紐約聾啞學校任教的耶魯大學畢業生布朗先生（Samuel Robbins Brown）被敦聘為馬禮遜學堂教員。在不足兩星期內，布朗先生被按立為牧師，完成婚禮並帶同夫人前往中國。他們於1839年2月抵達澳門。^⑤當時，中英關係正處於嚴峻局面。

布朗夫婦隨即前往廣州，與馬禮遜教育會的主席顛地（Lancelot Dent）和秘書裨治文懇談。在來華初期，布朗校長需要立刻學習中文，並探究中國的教育情況。布朗牧師在裨治文和衛三畏等的協助下，一方面學習中文，另一方面積極籌辦學校。隨着中英關係的日趨緊張，屬於英國籍的郭士立夫人無法繼續逗留在澳門，最後只能在1839年5月將女塾關閉。^⑥除了帶領三名年幼盲女經菲律賓前往英國外，其餘學員均被安排回家。因此，原有的校舍終於租給馬禮遜教育會。其

① 《馬禮遜教育會第一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6卷，第231—232頁。

② 按即郭士立夫人。

③ [清]容閱：《西學東漸記》，台北：廣文書局，1961年，第8頁。

④ 李志剛：《容閱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40、45—46頁。

⑤ 由於需乘搭在10月16日起航的馬禮遜號，一切安排到非常匆忙。布朗夫婦在10月10日完婚，情況與他的前輩裨治文相同，也是當時海外傳教的習慣做法。在一同前往的人中，有船東奧立芬先生和大衛亞庇牧師。經過125天的海上旅程，他們繞過好望角，在1839年2月19日抵達澳門，詳見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d W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3, pp. 61-65, 69.

⑥ 李志剛：《容閱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40頁。

後，布朗校長夫婦便入住在這所小洋房中，而學堂亦在上址營辦。這倒也因利乘便，女塾的部分設施自然得以繼續使用。

到了1839年11月4日，在澳門大三巴旁、馬禮遜教育會的會址上，布朗校宣佈馬禮遜學堂正式開學。關於馬禮遜學堂的校址，歷來均欠缺清楚的記載。根據目前唯一一本布朗校長的傳記稱：馬禮遜學堂“在澳門一所葡式大屋，面積110 x 60 英尺，前由郭士立夫婦所使用，現租作住所（按：即布朗夫婦的居所）和學校。這裏很接近賈梅士洞（按：賈梅士洞在澳門白鴿巢公園內，距馬禮遜墓地僅一箭之遙）”。^①由於校舍規模和教師人手的局限，第一批學員人數較少。當時只有一個班，共有六名學生（表1）。由於不同的原因，在一年後，他們只剩下一名學生Achik。^②學生留失率高和質素參差應是馬禮遜學堂辦學初期面對的最主要困難。

1840年，禮遜學堂共招收7名學生，其中亞倫和天佑因為品行欠佳被勸令退學，所以第二批學員最後只餘五名（表2）。加上第一批學員只剩唐亞植一人，布朗校長遂將之合併，並重新命名為第一班。這六人長期留在學堂，相較於後來招收的學員，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班。

資料顯示，在澳門時期共曾有29名學員入學（表3）。由於學堂的管理較為嚴謹，加上風氣未開，願意入學的學童並不太多。三份名錄共有11名學童在1842年11月隨校遷港，他們是“亞勝、亞根、亞焯、亞運、亞閔、亞傑、亞寬、亞駒、^③亞秋、亞煜、亞遠”。^④換言之，在澳門辦學的首三年，學生輟學的情況很嚴重，主要原因是們對新式教育疑慮重重。我們可以用唐寶臣的說法來作為代表。^⑤他曾對布朗校長說：

我不理解，為甚麼一個外國人會為我的孩子提供食宿和教育，而一分錢不收呢？我們一開始感覺這由中一定暗藏着甚麼不好的預謀。有可能是想把孩子們從父母身邊引誘走，一點一點地把他們送到國外去。^⑥

布朗校長也認為“這對家長來說都像謎一樣的難以猜透”。^⑦由此可見，要改變家長的觀念，讓

① 引文見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d W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3, p. 71.

② Atsuek（亞焯）在被父親帶走後，不久便再次向布朗校取申請返校。布朗校長不願輕易將已離校的學員恢復學籍，是怕造成先例。經過一年半之後，校長才容許Atsuek返回學堂。

③ 根據資料顯示，Aku也是來自唐家，1841年11月入學時為10歲。唐廷樞是1832年2月出生，也曾如其長兄唐廷植入讀馬禮遜學堂。1841年11月時年齡為9周歲零9個月，故學籍上填寫作10歲是極有可能的。又，據《中國叢報》第12卷第623頁所載學生名錄，籍貫是唐家的共有6名，只有唐廷樞為1832年出生。又，Carl Smith曾查閱英國國會文書，指出在香港一件案件中，律政司（The Attorney-General）指出“在眾多歐洲人或中國人之中，唐亞樞（Tong AKu）是一位最出色的譯員”（原文“Tong Aku was the Ablest Interpreter among the European and Chinese,” in 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3, 222, note 25）。據此，這名叫Aku的學員，肯定是唐廷樞。

④ 李志剛：《容閔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49頁，並據原表（《中國叢報》第12卷，第623頁）校正。由於是音譯，而中文的同音字較多，故難以確定是否完全正確。

⑤ 唐寶臣先後有三名兒子入讀馬禮遜學堂，他們是唐亞植、唐亞樞、唐亞富。前二人是馬禮遜學堂在澳門時期入讀的學生。

⑥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7頁。

⑦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7頁。

他們把孩子送到學堂去，當時是多麼困難的工作。這也是這時期學員輟學率很高的基本原因。^①

表1 第一批共6名學生名錄（1839年11月）

英文名稱	中文譯名	入學年齡	籍貫	離校時間	離校原因	備註
Aling	亞靈	16	澳門	1840年10月12日	品性劣，開除	/
Atsuek	亞焯	14	汕頭	1840年8月19日	由父領回	1842年6月1日複學
Ahop	亞合	12	前山	1840年2月10日	頑劣，開除	/
Ayun	亞遠	11	汕漳	1840年8月19日	遷居，離校	/
Awai	亞偉	11	汕漳	1840年8月19日	遷居，離校	/
Achik	亞植	11	唐家	/	/	Achik原誤譯為亞傑 ^②

資料來源：《中國叢報》卷12，第623頁。譯文基本參照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31—233頁。

表2 第二批共7名學生名錄（1840年）

英文名稱	中文譯名	入學年齡	籍貫	進校日期	離校日期	離校原因	備註
Akan	亞根	14	牛紅瀨	3月1日	/	/	或譯作亞剛
Awan	亞運	14	澳門	3月1日	/	/	或譯作亞文
Afun	亞寬	11	東岸 (Tungngon)	3月13日	/	/	即黃寬
Alun	亞倫	10	澳門	3月16日	1840年6月13日	不受勸導	/
Tinyau	天佑	11	南屏	3月28日	1840年6月28日	行為劣	/
Awing	亞閱	13	南屏	11月1日	/	/	即容閱，由郭士立夫人委託合信醫生推薦 ^③
Ashing	亞勝	15	澳門	1841年1月1日	/	/	即黃勝；因後來屬第一班學生，日期也緊接1840年，故列於此表

資料來源：《中國叢報》卷12，第623頁。按：譯文參照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32頁；又，表內Afun誤為Afan；卷12誤作卷13；現據原表（《中國叢報》第12卷，第623頁）校正。由於是音譯，而中文的同音字較多，故難以確定是否完全正確。

- ① 按：到了1845年9月，唐寶臣再對布朗校長說：“現在我懂了。我的三個兒子自從入學以來在你們學堂待得很好的，沒有受到任何傷害。我的大兒子現在已經成為一名合格的譯員，為大眾服務。其他兩個兒子也都沒有學壞。我一開始對你們教他們的宗教心有餘悸，但現在宗教使他們變得更好了。雖然我們國家的傳統禁止我信仰這個宗教，但我個人相信這個宗教是真實的。我現在沒有任何顧慮了。你們的辛勤勞動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人，現在我完全理解了。”見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7頁。
- ② 由於這份名錄將亞植（Achik）誤譯為亞傑，據第一批名錄所列，Achik是11歲入讀馬禮遜學堂，其出生年份應為1828年，故Achik只能是唐廷植。這個錯誤或始自容閱的英文自傳的中譯本《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其譯者將容閱記錄其同班同學的名字為“黃勝、李剛、周文、唐傑、黃寬”。這是容閱晚年所記的名單。1915年由徐鳳石、憚鐵樵譯出；譯文見[清]容閱：《西學東漸記》，台北：廣文書局，1961年，第7頁。容閱、黃寬、黃勝在1847年1月隨布朗校長去美國，容閱稍後入了耶魯大學，黃寬則1849年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習醫。黃寬在1857年回香港行醫，是香港著名的外科醫生，1879年因病逝世。黃勝抵美約一年後因病返港，從事編輯、印刷及翻譯等工作，1870年參與創立東華醫院的工作。1883年12月，黃勝被委任成為首位華人太平紳士。1884年至1890年獲委為定例局（即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02年逝世。
- ③ 馬禮遜學堂開辦半年後，合信醫生終於聯絡上在澳門當印刷工的容閱，遂命其回家向母親稟請，得到允許後，先安排他在醫務所工作數月，以觀察其品行和能力，才在1840年11月正式安排容閱到馬禮遜學堂上課。據容閱的回憶，當時學堂共有五名同學，被布朗校長編入此班。

表3 第三批共16名學生名錄（1841年11月）

英文名稱	中文譯名	入學年齡	籍貫	進校日期	離校日期	離校原因
Aku	亞駒	10	唐家	1841年11月1日	1842年1月1日	家庭約束
Atsou	亞秋	12	唐家	同上	/	/
Ayuk	亞焜	11	唐家	同上	/	/
Ayun	亞遠	14	汕頭	同上	/	/
Alik	亞力	11	官塘	同上	1842年1月1日	不守規則
Ami	亞美	12	南屏	同上	1842年1月1日	同上
Akwai	亞桂	11	崖口	同上	1842年1月1日	同上
Atsam	亞贊	11	汕頭	同上	1842年1月1日	同上
Apo	亞保	11	白沙石	同上	1841年11月14日	愚鈍
Atso	亞佐	12	上柵	同上	1841年11月6日	兄弟翹課
Ahung	亞鴻	11	上柵	同上	1841年11月7日	兄弟翹課
Afunlan	亞寬霖	11	後坑	同上	1842年11月1日	父母不準隨校遷港就讀
Alam	亞林	11	廈尾	同上	同上	同上
Afai	亞輝	13	鼓殼	同上	同上	同上
Aching	亞澄	12	鼓殼	同上	同上	同上
Alammuk	亞林茂	10	白沙石	同上	同上	同上

資料來源：《中國叢報》卷12，第623頁。按：譯文參照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32—233頁。

四、澳門馬禮遜學堂的科目安排

由於是初辦新式學堂，故澳門馬禮遜學堂的課程設置需要不斷改進，在澳門時期末段的馬禮遜學堂，正可以代表其中成果，在課程規劃上已為未來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澳門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之前，前後整整三年之久。其間科目安排日趨完備，我們可以從1842年9月《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布朗校長的報告瞭解學堂的課程安排。在科目設置上，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宗教、地理和歷史、品德等領域，而體育運動也在每天下午的時段以自由活動形式非正規地進行。因此，除了其後在香港階段增設的科學課程和音樂課程外，現代學校一般的課程已包括在內。以下是澳門馬禮遜學堂不同科目的具體安排：^①

（一）中文科

“每天上午進行中文和書法的學習，其餘時間用於英文學習。中文課他們仍然採用中國傳統的教學方式，老師還是去年那位中國老師。他的教學效率和中國大部分老師持平，和大多數中國老師一樣，他對所從事的工作頗有興趣。10個男孩子已經或幾乎可以背誦《四書》，並且複習了一遍。高級班的一個學生，已經開始閱讀朱熹編寫的集注，並努力理解消化。大多數學生理解孟子著作的意思，一部分學生理解孔子的文章，最難的是《詩經》，沒有一個人理解裏面的篇章。有些學生可以將孟子的文章翻譯成清晰地英文。在我的指導下，他們也或多或少地練習過翻譯部分中文版的新約……偶爾我會要求他們用中文寫信，與中國學校的相同年級比，算是比較超前的練習。結果他們自己說他們英文寫作的的能力比中文強，我對此深信不疑。”

^①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45—557頁。

“即使是練習把中文寫正確，也絕對是一項需要長期學習和練習的壯舉，從中國作家的情況和學校的普及程度上，可見掌握中文的人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少。語言結構並不複雜，因為從這方面來說，中文算是結構最簡單的語言之一，原因在於每個漢字都是一個任意的代碼，而不是由讀音有規律的字元組成，人們必須將自己置身在大量這樣奇怪的符號面前，看上去它們的設計對讀者發音和判定一點兒幫助都沒有，瞭解它們之間的結構和配合後，選擇並組織一系列的字來表達他的意思。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人們必須在記憶中存放大量這樣的奇怪的結構，才能連同他們的含義一同書寫在紙上，並遵從一定的位置規則。”^①

（二）英文科

（1）語法：

“（學員）從來沒有閱讀過這個方面的書本，瑪瑞（Lindley Murray）和其他文法家用很多的篇幅規定了語法規則，學員們對此一無所知……的確，他們不太可能……掌握一門外語而不學習語法。如果英文和中文不同，那他們必須要知道為甚麼不同，至少要瞭解不同在哪裏——這就是語法。我試圖教給他們語言的普遍規則……除此之外，他們對語法完全不瞭解，最起碼十分有限。”^②

（2）閱讀及寫作：

“有1200條英文短語的合集，翻譯成對應的中文短語。他們將對這本書進行記誦，並複習若干次；學習在對話中使用地道的英文以及閱讀英文文章對他們很有幫助。一年裏的大多時間，他們每天都會背誦這本課本，還接受寫作課和閱讀課的課程”。正如上文提及，學員“自己說他們英文寫作的的能力比中文強”，布朗校長“對此深信不疑”。他又認為學員“經常碰到以前從未接觸過的觀點、感情和事實，如果沒有學習英文閱讀，他們也永遠不會想到。這些知識對於英國和美國普通閱讀能力的兒童來說一點兒也不陌生，兒童讀物的作者也想當然地認為可以被年輕的讀者們理解，但對於學堂裏的學員來說，卻是陌生而又驚奇的”。^③

布朗校長在報告中提及“學員們對廣泛閱讀已經明顯產生興趣。高年級的學員在課餘時間，坐在我的書房或其他地方，手拿一本兒童讀物，寧願讀書也不去和低年級的學生運動，這樣的事情在學校並不少見。斯雷德（Slade）先生非常好心，幾周前送來了《廣州紀事報》，報紙放在教室裏，學員們為擁有報紙而感到自豪，如果讀懂了報紙上的內容，他們會非常高興。這份禮物啟發了他們，對每日新聞，尤其是和祖國有關的新聞也表現出了比以往更為濃厚的興趣”。^④

（3）口語

學堂為提高英語的表達能力，曾主動限制學員之間在日常交談時不說中文，只能說英語，否則以罰款的方式加以處分，有關款項則用來增購圖書。在“最初階段，罰款情況屢屢出現，每週總金額也相當可觀，但現在每個學員都很少再說中文，逐漸減少到沒有了”。^⑤

①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46—547頁。按：中國語文是單音節的表意文字，與印歐語系的標音文字截然不同，遂引來不太懂得漢字、但仍積極學習中文的布朗校長的批評。又，布朗校長曾對《三字經》、《四書》、《五經》等傳統教材——亦即對傳統中國教育——作出較全面的檢討，見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28—231頁。

②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3頁。

③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1頁。

④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5頁。

⑤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5—556頁。

（三）數學科

此前，學員在數學已有了些基礎，能做基礎計算，簡化複合，以及加減乘除。但是，數學教材的匱乏曾對教學造成不少的困難，“直到幾個月前，英國提供了一部分教材，連同其他有用的學校課本，福克斯先生善良慷慨的努力得以實現，教材被郵寄過來……科爾伯恩（Colburn）的代數學，他們學到了這本書的第40頁，幾乎從頭到尾完成了所有的問題……其中兩名學生……開始學習普萊菲爾（Playfair）的幾何學，每天學習一小時，其餘同學則用這段時間學習代數。他們的進度是已經閱讀並理解歐幾里得（Euclid）的前四本書，並且複習背誦了其中大部分的內容”。^①

（四）宗教科

根據教育會的《章則》，即“要為學員準備聖經，通過教學輔導幫助學員理解聖經，基督徒優秀的學校都有這樣的教學輔導，但對於聖經教義的接納程度並不影響學生的錄取”，並指出“聖經已經送達學員手中，我也很高興地提供了一切教學輔導幫助他們理解聖經”。此外，他也嘗試通過宗教活動來協助學員鞏固英文能力，例如，他指出：“學員們的宗教和道德品質教育不僅僅局限在教室裏。我們要求學員慶祝主日（星期日），在那天，他們早晨集合在一起，聽有關聖經的中英文講解，那些英語水平比較高能夠完全讀懂《聖經》的會被要求背誦經文，英語水平稍差些的則要背誦中文的經文，然後在晚上用中英文反覆朗讀《聖經》。在進行這些活動時，我們也會一起禱告，傾聽宗教音樂。在宗教學習上，我們留給學員的作業通常都非常少，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會覺得宗教學習是一門苦差事，主日（星期日）也是令人愉悅的一天，而不是讓學員們覺得我們在強加給他們這樣印象。”^②

（五）地理科和歷史科

學員“學習了蓋氏（Guy）的地理課本和彼得·帕利（Peter Parley）講述世界的故事，後者主要包括英美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勾起孩子們的興趣，並幫助他們記憶，這本書還體現了這位作者的風格。他們還認真學習並背誦了休姆（Hume）《英國歷史》的節選，已經學到了亨利八世時期”。^③

（六）品德教育

布朗校長非常重視學員的品德，重視以身作則，學員常因不守紀律而被開除，反映重視學員品德的嚴謹態度。但是，他又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教育家，受到學員的敬仰和親近。他強調對學員的關愛與培養，“合理範圍內的思想自由、評論自由和處理個人事務的自由正是我們希望他們學到的第一課……我們把學生當作家庭中的一員，為他們付出父母般的關懷……高年級的學生……在學校發揮着示範作用”，提升他們的自律精神，免除了他們的無知和迷信。^④

由此可見，經過三年來的改進，澳門馬禮遜學堂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安排上已初具規模，奠定了日後學堂的基本框架。當然，由於當時學堂開設僅有三年，學員程度仍處於較低水平，故部分較專門的學科如科學課程和音樂課程尚待後來的補充。

①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2—553頁。

②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3—554頁。

③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2頁。

④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4、556頁。

五、澳門馬禮遜學堂的歷史地位

澳門馬禮遜學堂創辦三年後，遷往香港黃泥涌的一座小山。這座小山被命名為Morrison Hill，^①是因為它被選為馬禮遜學堂的新址。相比於澳門原校址，香港新校並“不再像往日一樣，局限在狹小的地區”。^②該地段是由樸鼎查港督（Sir Henry Pottinger）批給的，並“得到了3,000美元的資助建校”。^③另一個搬遷的原因，是遷校到香港將獲得由港府捐助每年1,200元的辦學經費，這對馬禮遜學堂的前途將產生重要的作用。此外，澳門是羅馬天主教在東方的基地，基督新教在澳門的傳教活動受到不少的限制。澳門馬禮遜學堂雖非教會學堂，但主要負責人員如裨治文、衛三畏等均屬基督新教，校舍遷到香港應對未來的發展較為有利。

然而，短短三年的澳門馬禮遜學堂，仍應受更大的關注和肯定，因為它作為中國第一個新式學堂，在籌措辦學經費、招聘教員、招收中國學員、規劃適合中國青年需要的課程、選用及改善教材等眾多範疇均屬劃時代的創舉。這幾方面的經驗均極為寶貴，為日後香港馬禮遜學堂以至晚清其他學堂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澳門只是中國南部一個小漁村，但卻在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非常獨特的角色。它不但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也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先導者。馬禮遜教育會成立及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建，目的是：

替換掉這種古老陳舊的教育體制，這種體制只能夠培養出唯唯諾諾的只會說遵命的機器，我們應該將它廢除，幫助人們了解自己的本質，讓知識和美德的果實在中華健壯地成長。在古老的教育體制下，對美德和知識的追求還在萌芽狀態時就被扼殺了……我們來到這裏將這些年輕的中國孩子從這種災難性的扼殺中解救出來。^④

總而言之，澳門馬禮遜學堂的辦學目的，是為了美化中國年青人的人格，致力改良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點。這些工作，自然需要後來者的不斷承傳和改進，香港馬禮遜學堂只是其中之一。

[特約編輯 鄭振偉；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現譯作摩利臣山。原址已被剷平，主街仍稱為摩利臣山道。現址曾被用作校舍，稱為摩利臣山工業學院，今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利臣山）分校。

②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83頁。

③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4頁；按：這3,000美元是由馬禮遜教育會主席顛地（Dent）先生捐贈的。

④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25頁。